

# 1965年屠杀悲剧的幸存者要求政府道歉

## 无辜被扣押至今只能以唱歌疗伤



**音乐作为治疗：帮助创立Dialita合唱团的 Uchikowati Fauzia (中) 在雅加达的一次活动中与1965年暴行的女性幸存者同伴一起唱歌。**  
(由 Uchikowati Fauzia 提供)

**(本报讯) 1965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幸存者谈论他们共同创伤的挥之不去的挑战。**

Putu Oka Sukanta 仍然记得在他被法外监禁十年之前的事件。“我在地方军区指挥部[Kodim]被逮捕和拘留，然后被转移到雅加达莎林巴(Salemba)拘留中心，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被逮捕或遭受酷刑。”他说。

这位83岁的巴厘岛人少年时对写作的热情使他成为了一名记者和作家。他还是人民文化研究机构(Lekra)的活动家，该组织隶属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该组织在1965年9·30政变后被解散。

**唱歌手无辜被关押8年**

和Putu一样，Nani Nurani也被任意逮捕入狱。她从来都不是印

共(PKI)成员，但她作为歌手出现在1965年6月的印共周年纪念活动中唱歌，导致了她被指参与了当年所谓的政变企图的虚假指控。她被关押了八年，于1976年才获释。

“在关押牢中，[甚至]老鼠都不想吃那里供应的米饭。我们吃到了2 x 3厘米的豆饼和豆腐，还有被毛虫出没的菠菜，”这位81岁的老人回忆道。

**双亲被关押 13岁不允许上学**

无数的个人悲剧还包括被拘留者的家人。Uchikowati Fauzia 1965年11月双亲被捕后，她不得不搬到位于中爪哇省Kroya的祖母家，当时她只有13岁。她的父亲，D.A. Santosa曾担任芒拉札(Cilacap)县长因违反“反颠覆”法被判处20年监禁。1980年，他的刑期被免除，并从Nusakambangan的

监狱释放。与此同时，Uchikowati的母亲Hartati未经审判被关押在三宝垄女子监狱八年。Uchikowati因是印尼学生青年协会(IPPI)的成员而被停学三个月，该协会被指控与印共(PKI)有关联。停学后，她完成了初中，但之后不允许继续接受教育。

“当时，想要上高中的学生必须获得[官方]信函，说明他们没有参与9月30日的运动，”Uchikowati说。她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

**悲剧后的生活**

Nani从拘留所获释并不是她挣扎的结束。当局继续密切监视她。“就在我搬到雅加达北部后，一名babinsa[村级监督官员]指责我是Gerwani[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的成员，”Nani说。

在1984年Tanjung Priok事件之后，军事人员在一次公民骚乱中向抗议者开枪，Nani不得不定期向地方当局报告，并被禁止出国。

Putu则在获释后开始从事新的职业。在拘留期间，一名医生和一名狱友向她介绍了针灸。“我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获得我的技能认证。1977年，我参加了针灸认证考试，”她回忆说，她在参加考试一年后获得了雅加达卫生局的执业执照。

除了练习针灸，Putu还经常参加海外活动，讨论她的文学作品。这些活动

引起了当局的怀疑。她说：“1990年我从德国回来后，就因涉嫌接受一个地下共产主义组织资助我的海外旅行而被逮捕和拘留。”

与此同时，Uchikowati和她的兄弟姐妹，作为据称与印共(PKI)有联系的人的孩子，被耻辱所困扰。她的一个姐妹曾在一家州立医院担任护士，她接受了一项针对公务员及其家人政治背景的特殊调查。“我姐姐没有被解雇，但她没有得到任何提升的空间。她终于受不了，辞去了工作，去一家私立医院工作，”最终完成高中并获得学士学位的Uchikowati说。

**重建生活**

1998年苏哈托政权的垮台为政治变革铺平了道路，Nani受到鼓舞而为自己的权利而战。2003年，她提起诉讼，指控国家对她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留。“与被禁组织有关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获得终身省籍身份证。但我上法庭并赢得了我的案子，”Nani说。另一方面，普图(PUTU)由于对该国司法系统的严重缺乏信任而避开了法律途径。在新秩序政府垮台后，他的短篇小说、诗歌和书籍探讨了不公正、压迫和贫困的主题。

近日，Putu因其对文学的杰出贡献获得了巴厘务布特(Ubud)作家和读者节(UWRF Ubud

Writers and Readers Festival)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为了不放弃生活，我加强了自己。我写信是为了反对非人道暴行。”他说。

我国21世纪的民主改革促使Ucikawati(内科瓦蒂)与1965年拘留和杀戮的其他幸存者建立了密切的网络。2010年，她与友人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印尼团结”(Solidaritas Indonesia)的社区，致力于为大雅加达以外的幸存者提供经济支持。一年后，她帮助建立了Dialita，这是一个由1965年悲剧的女性幸存者组成的合唱团。

该乐队曾在公开场合演唱由1965年幸存者创作的歌曲，而唱歌的练习帮助Uchikowati舒解了她的创伤。“事实证明，音乐可以增强和滋养我们的灵魂。通过艺术媒介，我们邀请年轻人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她说。

1965年的大屠杀从未得到官方的调查，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Nani(纳尼)继续寻求正义。由于她从未被判犯有任何罪行，她要求政府正式恢复她的好名声。Nani仍然希望当局能够彻底调查并为1965年的暴行赎罪。“对于这一屠杀事件，必须有一个审查实况[关于真正发生的事情]。政府必须向那些未经审判而被监禁的人道歉，”Nani说。(莉丽译自雅加达邮报)